

高校青年教师师生关系的道德规范构建与优化路径

王良博

二、道德规范：高校青年教师师生关系的价值塑造

高校青年教师与学生间的人际关系直接影响教学效果与师生身心健康。青年教师肩负教学与科研双重任务，构建清晰明确、可操作性强的道德规范体系，是建立健康师生关系的重要前提。从理念、制度、实践三个维度优化师德规范，能够更好地助力青年教师践行立德树人的时代使命。

一、师生关系：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发展的核心命题

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不仅是高校最基本、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更是整个教育生态系统的关键纽带。师生关系的质量直接影响着教师的教学效果、科研指导以及职业发展，同时也决定着学生的学习成效、人格塑造和成长轨迹。良好的师生关系能够营造积极向上的教学氛围，促进知识的高效传递与创新思维的培养，进而提升整体人才培养质量。宏观来看，和谐的师生关系还是高校学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校风学风建设的基础工程，直接关系到高校的办学声誉和长远发展。构建新型的师生互动模式，建立相互尊重、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已成为推进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突破口。因此，深入探究高校师生关系的现实困境，对于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当前教育环境中，高校师生关系面临新型挑战，青年教师面对的难题尤其突出。其一，身份转型困难与角色定位模糊。初入高校的青年教師往往处于由学生向老师转换的转型期，面临“教学资历浅”和“管理经验不足”的双重困境。部分学生将师生关系简单理解为“服务契约”关系，角色认知错位严重影响教学活动。其二，多重考核挤压师生交往空间。以“非升即走”为代表的考核压力使青年教师往往在科研与教学中，师生实际接触时间较少，情感联系薄弱。其三，代际冲突与交往边界模糊。“00后”学生有着个性化的需求与想法，与青年教师传统的教育理念存在实际落差。其四，制度保障缺乏。相较于教学、科研成果有明文规定，师生关系缺乏科学的评价激励机制，师生矛盾调解机制不健全，青年教师常陷入“投诉恐恨”。

这些困境的形成既有社会转型的影响，也有高校体制机制的不足。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加速了师生关系的结构性变革，传统的“师徒式”关系正向“服务型”关系转变，转型过程中的价值冲突在所难免。同时，市场经济思维对校园文化的渗透，使师生互动中功利化倾向日益明显。高校内部现行的评价体系过分强调量化指标，忽视了教育的人文关怀本质；师德建设的形式化，使伦理规范难以真正内化为教师的行为准则。因此，引导青年教师树立正确的师生关系势在必行。

高校理工科教师助力中小学科学类课程建设的实践路径

张阳

我国高度重视中小学科学教育。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要着力加强创新能力培养，并面向中小学实施科学素养培育“沃土计划”；同月，教育部印发《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指南》，进一步强调完善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长效机制。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对中小学科学类课程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高校理工科教师助力中小学科学类课程建设的内在逻辑

高校理工科教师参与中小学科学类课程建设并非简单的资源叠加，是对科学教育综合性和实践性变革诉求的回应，蕴含着深刻的教育理论逻辑。

（一）人才一体化培养的内在需求。科学素养的培育是一个循序渐进、持续发展的完整链条。高校理工科教师参与中小学科学类课程建设，是推动人才贯通培养的关键环节，有利于在基础教育阶段发现并培育对科学具有浓厚兴趣和天赋的学生，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奠定基础。

（二）知识一体化整合的必然逻辑。科学教育是一条贯穿学生成长、融合知识与思维的完整学习链。高校理工科教师参与中小学科学类课程建设，有助于在不同学段间构建知识建构、思维发展与探究实践的连续体，帮助学生在成长早期建立对科学知识整体性与关联性的认知，实现科学素养的连贯提升，为后续深度学习筑牢基础。

（三）师资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追求。在推动中小学科学类课程建设的进程中，高校理工科教师的参与是一种深层的、有机的教师共同体协调发展过程。协作中，高校教师能进一步涵养教育情怀、提升教学敏感度，中小学科学教师则可增强学科自信与专业效能感。双方通过共同探索、创造与反思，助力青少年科学素养的培育

二、道德规范：高校青年教师师生关系的价值塑造

在构建和谐师生关系的过程中，构建明确的道德规范是重中之重。教师职业道德是调整教师在教育活动中一切道德行为的根本性要求，适用于教师职业活动的所有伦理关系和活动领域。在教学活动与过程中发挥着多维度、多层次的重要作用。

在价值引领方面，教师道德规范确定了教育伦理基础。《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等制度文件清晰界定了师生交往的行为边界，如“严禁学术剽窃、情感剥削等越界行为”，为处理复杂的师生关系问题提供了可操作的价值判断标准。道德规范还实现了传统师德精髓与现代教育理念的创造性融合。一方面，它传承了“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传统要求，延续了“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道传统；另一方面，又注入了“平等对话”“尊重主体性”等现代教育理念。更重要的是，道德规范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有机结合。它不仅规范师生“如何交往”，更指引“为何交往”——通过良好的师生关系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例如，在科研指导中，优秀的青年教师会自觉将学术规范教育融入日常指导，使学生在科研训练中同步养成学术伦理意识。这种价值引领作用，正是高校教育构建新时代师生关系的核心要义。

在行为规范上，教师道德规范为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行为构建了全方位的指导框架，具体体现为教学交往、科研指导和生活交往三个维度。教学交往维度规范教师的课堂言行，确保学术评价的公平公正，并支持教师合理使用教育惩戒权。科研指导维度规范科研经费使用，严格禁止导师不当占有学生研究成果，特别禁止通过学生账户套取经费等违规行为，还要求严格遵守学术伦理审查程序。生活交往维度规范青年教师社交媒体互动方式，对异性师生关系的处理进行了界定，倡导建立“亲而有度、清而有为”的良性关系。

在关系调节上，道德规范发挥着重要的平衡与调适作用。道德规范一方面为青年教师提供了处理角色冲突的伦理框架。在“严师”与“益友”的角色张力中，规范既要保持必要的学术威严，又倡导建立民主平等的对话关系。针对学术指导与行政管理的双重身份，规范明确要求区分两种职能，禁止利用行政权力谋取学术利益。在科研与育人的平衡上，规范引导教师将科研过程转化为育人资源。另一方面，道德规范有效化解实际认知差异。面对传统尊师观念与现代平等意识的冲突，规范创新性提出“尊重而不盲从”的互动原则；针对个人主义思潮，则强调集体价值与个人发展的统一。

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新时代，教师道德规范已转变为衡量教师专业素养的核心竞争力指标。对青年教师

师而言，卓越的伦理素养不仅可以有效防范各类教育风险，还显著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

三、高校青年教师道德规范的优化途径

对于高校青年教师而言，加快提升自身师德素养、构建良好师生关系，已成为其职业成长的重要任务。推动高校青年教师师德养成，既是新时代师德建设的基本要求，也契合青年教师的身心发展规律，具体可从理念、制度与实践层面协同创新。

理念上，青年教师需树立“重要他人”的学生观。所谓“重要他人”，即指在个体社会化以及心理人格形成的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具体人物。在教学活动中，这一学生观落实为因材施教，尊重每个学生的特点，给予学生足够的鼓励与尊重，促使他们充分发挥潜能。树立这一观念，要求青年教师从根本上热爱教育事业，争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始终热爱学生、关心学生，积极引导学生成长，用尊重与爱拉近师生距离。

制度上，学校有关部门应完善相应机制。评价机制上，在实行师德考核“一票否决”的情况下，要力避粗暴武断地处理，还可建立“师德档案”记录正面事迹与负面事迹。培训机制上，应突破传统讲座模式，成立“师德工作坊”，实行“师德导师制”。激励机制则可设置“师德标兵奖”，在职称评审中提高师德部分的比重。这些机制相互衔接、彼此促进，共同构成一个既严格要求又充满人文关怀的师德建设体系，真正实现“严管与厚爱相结合”的管理理念。

实践上，可集中聚焦教学、科研、生活交往三大领域。教学领域需明确课堂行为守则，禁止贬损学生人格、传播错误价值观等行为，同时公开评价标准，接受学生的合理质询。科研领域，则需严格执行学术规范，明确科研成果署名问题，明确界定抄袭、剽窃、数据造假等不端行为的具体标准。生活交往领域，则需与学生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建议避免单独密闭空间接触，谢绝贵重礼品馈赠。这些具体规范的建立，既保障了师生正常交流的需要，又维护了健康的教育生态。

优化师德规范的根本宗旨在于通过价值引领和制度保障，为教师专业发展赋能增慧，助其更好地践行立德树人的时代使命。通过构建“理念引领—制度保障—实践创新”的三维协同机制，能着力打造既有清晰边界又充满创造活力的师德建设生态系统，使师德规范真正转化为青年教师职业发展的“北斗导航系统”和“成长助推器”，在恪守底线的基础上充分激发教育活力，实现个人成长与育人使命的同频共振。

（作者单位：江汉大学人文学院）

新时代幼儿园家园协同教育模式研究

刘雄

学前教育在儿童成长中是非常重要的阶段，而家园协同教育作为连接家庭教育与幼儿园教育的关键纽带，正受到教育领域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在新时代背景下，教育理念不断更新，育人方式持续优化。家长参与幼儿教育意识逐渐增强，幼儿园与家庭的联系也更为紧密。家园双方在共同关注幼儿全面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多元互动、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为幼儿的健康成长营造了良好的教育环境。

一、共同商定教育目标，统一家园育人方向

家园共同商定教育目标，有助于教师与家长在育儿理念上达成共识，为幼儿发展提供稳定的方向指引。幼儿园可在学期初召开家长会，召集家长与教师共同探讨学期育儿重点与教育方向。教师可先梳理不同年龄段幼儿的发展特点及需关注的要点，并整理呈现给家长参考，引导家长表达在生活教育方面的期望与目标。双方围绕语言表达、兴趣培养等方面展开交流，最终确定一份共同认可的育儿目标清单。家长可在家中开展配合性的生活教育实践，如鼓励孩子完成小任务，并在家庭记录表上标注完成情况；教师则根据这些反馈调整园内教学活动的侧重点，确保孩子在家园两端获得一致的引导与成长体验。

二、深度研讨课程内容，实现家园资源互通

对课程内容开展深度研讨，能帮助教师

与家长清晰把握幼儿园教育的核心方向，从而确保家庭教育与园内活动的有效衔接。每学期教师制定课程计划时，可邀请家长参与课程说明会，详细介绍课程目标、学习主题与活动安排，同时讲解活动所需材料、操作方法及学习目的。家长则可分享家中可用资源，如手工材料等，支持孩子在家参与相关活动。之后，教师可建立课程微信群，定期分享课程进度、活动照片与操作技巧，鼓励家长在家中模拟或延伸课程内容。家长可根据提示开展家庭小活动，记录孩子的参与情况与表现，并将成果照片或视频反馈给教师。教师则依据家长反馈调整课程设计，以此实现家园教育资源的互通。

三、协同开展主题活动，丰富幼儿成长体验

主题活动是幼儿教育的重要载体，家园协同能让孩子在不同环境中获得一致且丰富的体验。幼儿园可制定学期主题活动计划，如植物观察、节日庆典等。针对每个主题活动，教师提前整理活动流程与所需材料清单，通过微信群或家园手册告知家长，邀请家长在家准备相关材料，或提前与孩子探讨主题内容。活动开展时，教师在园内指导孩子完成操作，家长在家同步开展类似实践，如种植小植物、制作节日手工，并记录孩子的观察过程。活动结束后，教师与家长可根据组织线上分享或线下小展会，让孩子讲述自身体验与发现。通过这种方式，家长与教师在活动策划、执行、总结环节形成紧密合作，孩子的成长体验更加全面立体。

（作者单位：岭南师范学院科学学院）

千年儒家书院教育的现代意义

张周志

儒家圣人孔子，堪称开创中国人文教育高度的第一人。他提出的“有教无类”平民教育理想，以及“一体之仁”与“差等之爱”的因材施教仁爱教育方法，在人类教育思想史上留下了永恒的光彩印记。两千五百多年来，儒家诗书礼乐的雅化教育传统，正是孔子平民教育理念的发扬光大。尤其是自北宋兴起的千年儒家书院教育，将圣人孔子开创的“学以成人”普遍性教育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

儒学教育的实践载体历来有“学在官方”的传统，从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释道三教交融的文化繁荣盛况，其传承发展多依托官办学堂。然而，唐代崇尚生命强度系数的非理性时代精神，导致社会从盛唐极盛骤然跌落至唐末五代的崩溃。为总结反思这一历史教训，宋初推行“兴文教、抑武事”国策，弥补官学不足的儒家书院应运而生，并迅速繁荣普及。直至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朝廷颁布书院改学堂的诏书，延续千年的儒家书院教育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文化传承与社会服务等方面积累了诸多弥足珍贵的经验，值得今日教育界认真汲取。

严格意义上的儒家书院，真正诞生于北宋。宋初的几次兴学运动中，王安石、范仲淹等积极带头弘扬儒家精神，极大激发了读书人讲学办学的热情。他们以开拓万古心潮的豪气纵贯古今，横论百家，纷纷创建儒家书院。宋徽宗名超逊的四大书院，留存着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等大儒讲学殿堂的大量历史记载。书院推动了理学复兴、教育繁荣与人才辈出，尤其是朱熹亲自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更成为儒家书院教育的“宪章”，深刻影响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迄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代统治者意识到书院教育的积极作用后，立刻推行以理学为核心的汉化教育，促使儒家书院迅速走向鼎盛。太極书院建成后，不仅续修周敦颐祠，以程颐、程颢、张载、杨时、游酢、朱熹六位理学名儒配祀，还刊周敦颐画像，并延请江南名儒赵汝愚，由此开创“北方有程朱理学，自赵氏讲学太极书院始”的先河。元朝一统南北前后，忽必烈多次立法保护书院与儒学，后续更将书院纳入官方学术体系。这不仅使中华民族文化在战乱中免遭断绝，更依托书院实现了儒家文化西传北新的重要复兴。

明代正德、嘉靖年间，朝廷开始支持并鼓励书院发展，推动其在国内广泛普及，并加速向海外传播。尤其是以王守仁、湛若水为代表的思想家群体，以书院为讲学阵地，掀起思想解放思潮，使书院再度兴盛，进入空前繁荣的阶段。明代书院“学理一体化”的积极成果，更奠定了书院走向海外的思想与方法论基础。中国书院文化东传朝鲜半岛后，催生了贯穿李氏朝鲜时期的书院体系；书院与学术思想的深度交融，为李朝统治筑牢了文化根基。随着书院持续向外辐射，其影响逐渐传入日本、东南亚，甚至远及欧美——明代书院由此成为联通中外、开展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清代自雍正年间会书院制度兴起，在官代与民间力量的合力推动下，书院发展迎来空前繁荣。各地官办书院主导全国学术繁荣，遍布乡野的宗族书院则星罗棋布，承担着基础教育与蒙学教化的重任。道光以后，书院一方面逐渐引入西学与新学，一方面却大多走向消极演变。尤其是嘉庆考据之学兴起后，随着书院与学术的再度结合，其已基本普及至全国城乡。

从宋初创立至1901年改为大小中各级现代学堂，千年儒家书院“学以成人”的丰富经验对于现代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是志于探索追求真理之大道

现代大学各学科专业都有其独特的专业道德，要求从事相关专业学习与研究的师生，首先树立从事该学科专业学习的弘道精神。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其本身以探索人类生存与文明发展方式为宗旨使命，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更决定了学科探索的艰巨性。我们应向古贤学习，树立崇高的读书治学理想，志于追求学术的大道，以纯粹高尚的动机投入学术研究。既要拥有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的雄伟抱负，也要具备周恩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崇高理想，更当怀有左宗棠“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高古境界。

二是据于天地万物之性的正德

古人治学，必以“尊德性”为先导，而后方能“道问学”。德性之虽非源于见闻，却能无所不知。因此，千年儒家书院教育始终将德性教育置于核心位置。《礼记·中庸》有云“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明确将天赋德性视为君子求知达智的主体前提。儒家推崇“正德、利用、厚生”的思维逻辑，其起点与归宿皆在“正德”，而“仁”“智”“圣”则是儒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尚书·大禹谟》记载：“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中庸》对其释义为：“正德”即穷尽人本性的以端正人道德，穷万物之本性以端正其德；“仁”“智”“圣”是使万物本性平直中正、无偏无颇；“利用”指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厚生”意为滋养百姓，使其衣食富足；“和”则代表万物相融、平衡协调的状态。这体现了大禹治国理念中“正德”的首要地位，视其为“利用”“厚生”的前提。

千年书院教育首先要求学生研读圣贤典籍，其核心在于“贤贤易色”——以尊崇贤德取代对容貌的关注，致力于成为品德高尚之人。书院教育强调“修己以敬”，引导学生向内反求诸己，践行忠恕之道，先修养私德，再恪守公德，最终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论语·雍也》将“能近取譬”视为“仁之方”，而“推己及人”的内涵，正包含了从私德到公德的外延拓展。书院教育一方面要求学生坚守“克己复礼”的原则，另一方面也引导他们认识到礼有因时损益的特性。

三是依于侧隐之心的君子之仁

君子怀德，贵在有仁爱之心。圣人孔子早已觉悟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不仁者不可以处长乐，不可以处久约。”因此，儒学思维的全部功夫在于唤醒人心的仁之善端。君子所以异于王者，在于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孔子的仁爱学说，董仲舒的“天生五谷以养人”的天人感应思想，张载的“民胞与学”学说，程颢的“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天理人欲之辨理论，无不将自然社会诸关系伦理化。道家表面上主张“绝圣弃智”“洁身自好”，强调“不以物累，不以物役”，但其“道法自然”的生死轮回转世说，实则突显了个体价值实现过程中对理想自然人格的道德向往。佛家倡导“万法皆空”，了自性，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超世哲智，其本质也是以劝善惩恶为目的。法家因循“人皆以计算之心相待”，曾被视为“非道德主义”，然而，被称为“醇儒”的董仲舒所宣扬的儒家政治伦理“三纲”，恰恰源自大法家韩非的思想。“三纲”与“五常”相配，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以伦理为本位的致思趋向中精神文化的核心。

四是游于精湛的专业能力之艺

这里的“艺”，指的是娴熟精湛的专业能力。现代大学的核心使命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因而我们的教育理念既要以德性立人，也要以专业成才。各门专业学科的形成与发展，都承载着悠久的历史脉络与丰富的知识积淀，这正是大学阶段需要潜心钻研、汲取的宝贵财富，也是练就精湛专业技艺的根本路径——读书、研究、思考、行动。唯有做到这一点，才能更深入地开展学习，体悟古人治学的精神内核。

遵循“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儒家书院培养的学子能够在严格修身处世的前提下，始终能够“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德才兼备、治国平天下的大才。如今的大学教育，在专业教育的基础上，若能积极汲取千年书院教育的宝贵养分，充分彰显其精神内核，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教育、学科专业知识技能的规范培养，以及优秀传统文化学习有机结合，坚持“为育人、为国育才”，必能培养出具备全球视野、人类情怀、道德高尚且业务精良的一流人才。

（作者单位：西安外事学院）

初中历史视角下洋务运动对近代工业发展的具体影响分析

程倩倩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让清朝统治者认识到传统军事装备和生产方式已经难以应对时代变化。19世纪中后期，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中开始寻找自救道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出“自强”“求富”的主张，掀起了洋务运动。从初中历史学习的角度看，洋务运动虽然没有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道路，却在近代工业发展方面产生了具体而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创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还推动了机器生产、交通运输、工业人才培养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工业起步的重要标志。

洋务运动对近代工业发展的第一个具体影响，是推动中国出现了一批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军事工业。过去，中国传统手工业主要依靠人力和简单工具，生产效率低，产品标准化程度不高。洋务派认识到西方军事力量强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拥有先进的枪炮、机器和兵器制造能力。因此，他们首先把重点放在军事工业建设上。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企业相继建立，这些工厂引入西方机器设备，采用近代生产方式，制造枪炮、弹药、轮船等军用产品。它们的出现，改变了中国长期依靠传统手工业制造武器的局面，使中国开始接触近代工厂制度和机器生产方式。这一点对于近代工业发展十分关键，因为工业化的基础正是机器生产和工厂组织。

洋务运动的第二个影响，是促进了近代民用工业的发展。随着军事工业不断扩大，洋务派逐渐发现，仅靠官府财政支持难以长期维持庞大的工业建设。于是，他们开始创办与发展关系更密切的民用企业，以达到

“求富”的目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企业陆续出现。这些企业涉及航运、采矿、冶铁、纺织等领域，已经不再只是为了制造武器，而是直接服务于生产、运输和市场需要。例如，开平煤矿为轮船、铁路和工厂提供燃料；轮船招商局增强了中国自己的航运能力；汉阳铁厂推动了钢铁工业的发展。这些企业虽然仍带有官办或官督商办色彩，但它们打破了传统经济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格局，使中国近代工业门类开始增多，为后来的民族工业发展提供了经验。

洋务运动还带动了交通运输和基础设施的近代化。工业发展离不开煤炭、铁矿、机器、产品及劳动力的流转，若交通落后，即便工厂建成，也难以实现稳定生产与市场拓展。为此，洋务派积极兴办轮船航运、尝试修筑铁路、推动电报事业发展。这些举措在当时具有开创性意义。轮船相较传统木船，速度更快、载重量更大，能显著提升货物运输效率；铁路可加强矿区、工厂与市场间的联系；电报则加快了信息传递速度。交通与通信条件的改善，使工业生产不再局限于局部地区，而是逐步与更广阔的市场建立关联。近代工业并非孤立的工厂建设，而是需要交通、能源、通信协同支撑的系统工程，洋务运动正是在这些领域迈出了早期探索的关键一步。

在人才培养方面，洋务运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代工业需要懂外语、懂技术、懂管理的新式人才，而传统科举教育主要培养的是熟读经书、参加考试的士人，难以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为解决这一问题，洋务派创办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新式学堂，并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这些学校开设外语、数学、物理、制造、

航海等课程，培养了一批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人才培养的意义不仅在于满足当时工厂和船政建设的需要，更在于改变了部分中国人对知识和技术的认识。过去，许多人重视传统经学而轻视自然科学，洋务运动则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技术、机器和工业生产对国家实力的重要作用。

当然，从初中历史视角分析洋务运动，也必须看到它的局限。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清朝落后的政治制度。他们希望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实现“自强”“求富”，这决定了洋务运动不可能真正完成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许多洋务企业管理效率低下，官僚习气浓厚，资金使用缺乏有效监督，技术上也长期依赖外国设备与人员。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印证了单纯引进机器和机器，并不能真正扭转国家落后的命运。工业发展不仅需要机器与工厂，更离不开制度、教育、市场及社会环境的协同支撑。

总体来看，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影响是具体而真实的。它创办军事工业，推动中国开启近代武器的机器制造；兴办民用工业，助力采矿、航运、钢铁、纺织等行业实现初步发展；改善交通通信条件，为工业生产与商品流通提供便利；培养新式人才，促进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尽管洋务运动未能带领中国走向真正富强，却开启了中国近代工业化探索之路。对于初中生而言，学习洋务运动既不能只记住“失败”二字，也不能简单否定其作用。更准确的理解是：洋务运动以维护清朝统治为目的，最终虽未实现救国目标，但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与发展，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步。

（作者单位：山东省济南泉城中学）